

為抗日救亡奔走呼號

一、在「一·二八」抗戰中

「九一八」以後，宋慶齡與全國人民一道同聲譴責國民黨政府對日本侵略者的不抵抗政策，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在《國民黨已不再是一個政治力量》的宣言中，宋慶齡譴責國民黨屠殺愛國學生的一「珍珠橋慘案」。她大聲疾呼：「我不忍見孫中山四十年的工作被一小撮自私自利的國民黨軍閥、政客所毀壞。」她號召中國人民起來進行保衛祖國和反對本國統治者的鬥爭，並且滿懷信心地指出：「我深信：雖然今天當權的反動勢力在進行恐怖活動，中國千百萬真正的革命者必不放棄自己的責任；反之，由於國家當前形勢的危急，他們將加緊工作，朝著革命所樹立的目標勝利前進。」

宋慶齡說到做到。在即將發生的「一·二八」淞滬抗戰中，她加緊工作，並勝利前進了。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帝國主義侵犯上海。駐在上海的以蔣光鼐為總指揮、蔡廷鍇為副總指揮兼軍長的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在市民的支持下，違背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奮起反擊，爆發了著名的淞滬抗戰。

當時日本由於在東北得手，氣焰十分囂張，揚言要在四十八小時之內佔領上海，戰況十分激烈。這時蔣介石已經重新上臺，任軍事委員會主席和全國武裝部隊的總司令，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長。他們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侵略下驚惶失措，立即把首都遷到洛陽，並謀求向日本妥協，陰謀破壞抗戰。

在這緊急的關頭，宋慶齡與上海軍民同仇敵愾，積極進行支援十九路軍抗戰的活動，並多次親臨前線慰問傷病戰士。戰爭爆發的第二天（即一月二十九日），她就與何香凝商量支援十九路軍抗戰的問題。何香凝是在「九一八」事變後，在法國巴黎聞訊後急忙歸國的。她用賣掉自己字畫所得的錢，在上海辦了一個培養戰時救護人才的短期婦女救護班，為抗日救治傷病員服務¹⁶⁶。「一·二八」事變一發生，她就同宋慶齡等人一起籌備慰勞事宜。三十日，宋慶齡與何香凝一起，隨著滿載慰勞品的卡車親自到真如前線。



一九三二年，宋慶齡與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合影。

這天，在真如前線，清晨和午後都有激戰。宋慶齡和何香凝首先與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親切交談並合影留念。¹⁶⁷然後，她們冒著槍林彈雨，親臨吳淞前線慰問正在交戰中的翁照垣旅，目睹抗日將士與敵人浴血奮戰的壯烈情景，深受感動。¹⁶⁸

二月六日，宋慶齡又與弟媳、財政部長宋子文夫人張樂怡一起，攜帶許多慰勞品再到真如前線勞軍，慰勉官兵奮勇殺敵。¹⁶⁹

二月十二日，宋慶齡再次冒著敵人的炮火，到吳淞前線慰問十九路軍官兵。她在翁照垣旅長的陪同下，巡視了前沿陣地，並在前線指揮所與區壽年、翁照垣等師旅指揮官親切交談。當時，在指揮所上空雖有低空飛行的敵機不時向地面掃射，但宋慶齡鎮定自若，輕蔑地望著肆虐的敵機，表現出一派巾幗大將的風度。她還向在場的戰地記者發表談話，高度讚揚十九路軍抗戰的重大意義，並鼓勵翁照垣說：你們「守吳淞立功極偉，而尤望繼續奮鬥，不使中國有寸土入於敵人之手」。翁照垣即代表全體將士莊嚴地表示：要「以衛士之責……使敵人無越雷池一步之機會」。¹⁷⁰

在宋慶齡的推動和影響下，孫科夫人陳淑英以及陳友仁夫人、梁寒操夫人等，在二月十五

167 蔣光鼐、蔡廷鍇、戴戟：《十九路軍淞滬抗戰回憶》，載全國政協編《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七輯；《紀念宋慶齡同志》（畫冊），圖第八八號，文物出版社出版。

168 同上。

169 《蔡廷鍇自傳》第二百八十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170 《申報》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三日。

日也紛紛奔赴真如前線慰勞抗戰部隊。

宋慶齡從多次親臨前線慰問官兵中，目睹十九路軍戰士的生活給養很差，醫護更是奇缺。她返回上海後就同何香凝等緊張地投入為部隊籌餉和建立傷兵醫院的工作。

鑒於當時上海原有的傷兵醫院組織不嚴密，工作效率又極低，宋慶齡提出要單獨籌建專門醫護抗日受傷戰士的醫院。她的提議得到各界愛國人士的熱烈回應。孫中山好友、交通大學校長黎照寰借出部分校舍，新加坡著名華僑胡文虎捐款一萬元，先施、永安、新新三大公司的資方也都踴躍捐獻錢、物。在國立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楊銓（杏佛）的具體幫助下，很快就在交通大學開辦起一所擁有三百張床位的「國民傷兵醫院」，並分設了臨時醫院、臨時救護站多處。宋慶齡和何香凝等數人擔任理事，聘請中西醫專家多人負責醫療事務，所有職員均為義務職，不領取一分薪俸。在宋慶齡號召和群眾愛國熱忱的推動下，傷兵醫院中一時名醫雲集，慰勞品和醫藥用品也源源不斷地流向宋慶齡住宅辟出的臨時倉庫裡，並日夜不停地發放出去。

與此同時，何香凝自己把同十九路軍軍官一起募捐到的慰勞款項，也用於創辦傷兵醫院。她在上海公時學校、政法大學及蘇州等地開辦了四處共可收容受傷病員千余人的醫院。何香凝為進行這項工作，經常派遣原來在國民黨中央婦女部工作的黎沛華、陸晶清等人到莫里哀路宋慶齡的寓所，向她彙報工作計畫和實施情況，宋慶齡總是耐心地聽取彙報，誠懇慎重地提出意見，並對她們的工作表示感謝和慰問。

宋慶齡還經常到醫院慰問傷兵，並特地選購《小桃紅》等廣東樂曲唱片慰問廣東籍的傷

病員，用家鄉音樂減輕他們肉體上的傷痛，激發他們的愛國熱忱。傷兵們深受感動和鼓舞，紛紛表示「急欲出院」，返回前線去奮力殺敵。¹⁷¹

宋慶齡還把傷兵醫院當作宣傳抗日和組織募捐的陣地。在醫院中接見記者時，宋慶齡明確表示：「對於抗日戰事，當然主張積極抵抗到底。人類唯有從奮鬥中求生存。」她盛讚十九路軍「明知眾寡懸殊，器械財力均不如人，而能不顧一切，以血肉為中國爭一線之生機，使世界知中國尚有不可侮之軍隊與民氣，不特為軍隊之模範實為革命之武力與反帝國主義之先鋒。」¹⁷²

當時，由於戰爭的巨大消耗和南京政府拒不援助十九路軍，所以，組織群眾募捐的任務十分繁重。當年在宋慶齡身邊幫助募捐工作的顧淑型回憶說：宋慶齡為此「幾乎每天在外面奔走，常忙得連午餐都顧不上吃」。¹⁷³

《申報》館是當時上海一家最大的民族資本的報館，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立場和主張，對這場保衛上海的戰爭持積極支援的態度。宋慶齡在楊杏佛的陪同下，會見了該報總經理史量才，史量才即為十九路軍捐獻一筆數目頗大的軍餉。¹⁷⁴

淞滬抗戰時，正值嚴冬，大雪紛飛。宋慶齡和何香凝到前線慰問看到抗戰官兵卻衣著單

171 《申報》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172 《在國民傷兵醫院答記者問》，載《宋慶齡選集》第五十四頁，中華書局出版。

173 陳翰笙：《談談孫夫人的高尚品格》，載《宋慶齡紀念集》第一百一十八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顧淑型是陳翰笙的夫人，當時協助宋慶齡做募捐工作。

174 陳少校：《黑網錄》第六十六、六十七頁，群眾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

薄，便立即在上海市民中發起縫製棉衣活動。她們在五天之內就籌集到全新棉衣、棉褲三萬多套，運送給前線官兵穿用，解除了燃眉之急。¹⁷⁵

此外，何香凝又在寓所門口張貼出籌款和徵募物資的告白，在東亞酒家二樓展廳主辦了「義賣畫展」，並致電海外華僑請求支援。受中共中央派遣到上海進行傷兵救護工作的張瓊回憶說：當時，「為了支援十九路軍作戰的軍需，籌建傷兵醫院，援助罷工工人，何香凝、宋慶齡幾乎把錢都花光了」。¹⁷⁶

十九路軍的奮勇殺敵和宋慶齡、何香凝熱情為抗戰奔走的行動，大大地鼓舞了軍民士氣，也感動了國民黨中有愛國熱忱的一些上層人士。駐在上海市郊張治中的兩個師——八十七、八十八師，於二月中旬主動與十九路軍協同作戰；山西的閻錫山，也於二月九日派員專程送給十九路軍數門迫擊炮和六百發炮彈。¹⁷⁷

宋子文也深受宋慶齡抗戰救國行動的影響。同時，他作為國民黨政府中的英美派代表，為了維護英美帝國主義在上海及中國的既得利益，在面臨日本侵略的嚴重威脅下，就與宋慶齡一致採取支持十九路軍抗戰的行動，所以也於二月六日派遣夫人隨同宋慶齡到前線慰問。在這以後的幾年間，宋子文與宋慶齡的姐弟關係也比較好，兩人經常往來，晤談歡聚，並留

175 蔣光鼐、蔡廷鍇、戴戟：《十九路軍淞滬抗戰回憶》，載全國政協編《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七輯。

176 張瓊：《劉少奇同志在上海革命活動片斷》，載上海《黨史資料》（叢刊）一九八〇年第二輯。

177 《蔡廷鍇自傳》（上）第二百八十一、二百八十四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下不少合影的照片。178

「一·二八」抗戰期間，正是王明「左」傾路線統治中國共產黨最倡狂的時期。王明錯誤地認為，十九路軍和宋慶齡、馮玉祥違抗蔣介石的禁令進行抗戰，以及他們得到廣大中間人士的擁護，是「敵人的欺騙陰謀，中間派是最危險的敵人」。他指示上海地下黨，「要和中間派劃清界限，不能和宋慶齡、馮玉祥等接觸」¹⁷⁹。但是，王明的錯誤路線不得人心，遭到中共下級黨組織、週邊團體和廣大黨員的抵制。因此，在戰爭爆發後，上海中共地下黨及「左聯」、反帝大同盟、工會、學生會等組織雖然受到「左」傾路線的干擾，還是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支援十九路軍的活動，並且早在「九一八」事變後組成了上海民眾反日救國聯合會，開展抗日救國活動。如進行募捐、慰勞、支前和宣傳鼓動等工作，並深入戰區搶救傷患和難民，運輸槍支彈藥、食品等軍需品到前線。¹⁸⁰

一月三十一日，滬西區日資紗廠工人舉行總同盟罷工，滬東區和閘北區要求抗日的失業工人，也先後彙集到滬西區參加鬥爭，以抗議日本的侵略，支援十九路軍抗戰。「民反會」為支援滬西工人反日罷工，組織一百多個募捐隊，向廣大市民進行宣傳和募捐活動。

宋慶齡大力支持滬西工人的反日愛國行動。她得知滬西罷工工人生活發生困難的消息後，

178 《紀念宋慶齡同志》畫冊，圖一〇二、一〇三、一〇四等。

179 劉曉：《十年內戰初期江蘇省委領導下的一些鬥爭》，載上海《黨史資料》（叢刊），一九八二年第一輯。

180 丁玲：「九·一八」和「一·二八」期間我在上海參加的幾次抗日救亡活動》，載上海《黨史資料》（叢刊），一九八三年第三輯。

即派秘書與「民反會」聯繫，把募集到的兩萬元捐款轉交他們，用以支援反日罷工的鬥爭。「民反會」的負責人曾到宋慶齡寓所彙報罷工情況，宋慶齡熱情讚揚滬西工人的反日罷工鬥爭，認為這次罷工不論在政治上或經濟上，對日本帝國主義都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這樣，宋慶齡和何香凝等人的抗日活動就同上海中共地下黨的活動匯合在一起，使上海出現了一個捐獻和參戰的熱潮，現款、金銀、日用品、藥物、器材等從四面八方源源而來，僅一月三十日一天中，就收到捐獻現金十萬元。在整個淞滬抗戰期間，共籌款七百萬元，相當於十九路軍八九個月的軍餉的總數。與此同時，所成立的各種義勇軍、敢死隊等各種組織，也有力地配合了十九路軍的抗敵鬥爭。

正因為有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十九路軍得以抗擊優勢敵軍達一個月之久，終使狂妄叫囂在四十八小時中可消滅十九路軍、三日內可封鎖中國的日本侵略軍受到沉重打擊。他們雖三易主帥，多次增兵，也未能越雷池一步，始終被壓縮在吳淞沿海一線。後來只是由於國民黨實行妥協投降政策，答應了日方提出的屈辱性條件，才迫使十九路軍於三月一日起撤離陣地。

當時，宋慶齡在對新聞記者所發表的談話中，高度讚揚十九路軍的抗戰精神，嚴厲批評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指出十九路軍的英勇抗戰表明，「中國不特未因抵抗而亡，反因抵抗而益堅國民犧牲奮鬥之志。人皆以中國此次戰爭為失敗，實則中國在精神上完全勝利」，而

日本的暫時勝利，只能增強其「侵略與帝國主義之野心，終於自取覆亡而已」。181 宋慶齡對戰爭勝負的觀點，充滿了辯證法，寓意很深刻。後來的歷史證明，她當年的預言是多麼的正確！

十九路軍在淞滬抗戰中表現出來的「民族之魂」，在宋慶齡身上也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因而獲得人們的高度讚揚。當時一個美國記者在採訪宋慶齡在上海抗戰中的事蹟後感歎道：「孫中山先生之宋夫人，德才如玉，剛強正直，愛國義勇，不畏強暴，極力宣傳抗敵救國，卓有成效，舉目環球，無與倫比，啊——她是一位敢死之救國女傑。」182

二、參加國民禦侮自救會

日本侵略軍在上海受挫後，就把侵略重點移向北方。一九三二年二月，他們妄稱東北已脫離中國，組織傀儡政權「滿洲國」。翌年一月初，又宣稱熱河省為「滿洲國」的領土，攻佔了山海關和臨榆縣城。中國軍民進行了英勇抵抗，山海關守軍全部壯烈犧牲。但國民黨熱河省省長湯玉麟推行不抵抗政策，聞訊逃竄，並徵調汽車二百多輛運送私產到天津租界，致使熱河省僅十天就全部淪陷。

宋慶齡得悉榆戰發生的消息後，即準備北上組織婦女救護隊，救護傷兵。後因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會務難以分身，改派同盟總幹事楊杏佛赴北平慰問榆戰傷兵。同年三月，她與中國

181 《在國民傷兵醫院答記者問》，載《宋慶齡選集》第五十四、五十五頁，中華書局出版。

182 轉引自范錦泉：《淞滬抗戰中的宋慶齡》，載《團結報》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共產黨合作，聯合上海三十多個進步團體，組成共產黨的週邊組織「國民禦侮自救會」，被推選擔任會長。

三月八日，宋慶齡參加了共產黨在八仙橋青年會召集的「禦侮會」籌備大會，並發表了長篇演說。她憤怒譴責熱河省省長湯玉麟開門揖盜的罪行，明確指出對於這種賣國行為應負責的「是蔣介石政府」，「因為這個政府用它的主要軍隊打中國的人民」，並且「不肯武裝人民，不肯組織義勇軍來進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戰爭」。

宋慶齡在演說中，第一次提出她對於中國抗戰的全面主張，即四項要求：（一）派遣全國至少百分之八十的軍隊，去抵抗日本帝國主義，收復東北、熱河，保衛中國；（二）武裝人民，並組織義勇軍；（三）立即恢復人民的民主權利；（四）停止向中國蘇維埃區域進攻。在闡述第四條要求時，宋慶齡強調指出：中國的蘇維埃政府不但已經對日本帝國主義宣戰，並且曾於今年一月提議，在停止進攻蘇區、恢復人民的民主權利、武裝人民的條件下，蘇維埃政府願意與任何軍隊或武裝部隊合作，抵抗日本帝國主義。

這個主張，由於貫徹了「民族解放與社會解放」相結合的原則，成為當時各種各樣的救國主張中最全面、最徹底的主張，這些要求實際上也是共產黨的主張。它為翌年宋慶齡接受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救國六大綱領奠定了基礎。

當時，中國工農紅軍正遭受蔣介石的軍事「圍剿」；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受到嚴密封鎖。所以，宋慶齡在演說中宣傳共產黨兩個月前發佈的、在三個條件下中國工農紅軍準備和一切武

裝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重要聲明，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這對共產黨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宋慶齡認為，實現這些要求不能依靠反動當權者的恩賜，「蔣介石政府不能統一中國，不能領導武裝人民進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戰爭，不能給農民土地」。因此，「必須準備鬥爭。我們必須把各個工廠、學校、大學、城市和村鎮組織起來。每一個家庭、商店和工廠都應當討論我們的要求。我們的要求必須在大街小巷中成為洪流……這種行動將是一個廣泛的反帝鬥爭，最後將匯合起來成為武裝人民反對日本及其他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戰爭」。183

籌備大會通過了組織章程，並作出幾項與宋慶齡提出四項要求相呼應的決議。

「禦侮會」是宋慶齡在大革命失敗之後，同中國共產黨合作建立的第一個革命組織。

由於兩年來中國共產黨推行「左」傾路線，使黨本身及其週邊組織在上海受到極大摧殘，革命活動很難開展，中央機關也被迫於一九三三年一月遷往蘇區。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造成的民族危機日益深重，中共的任務也更加重了。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不得不改變過去不與宋慶齡接觸的錯誤做法，有些工作還需要依靠她的說明去進行。通過合作，雙方越來越加深瞭解和信任，關係也越來越密切。也正是通過這種合作，中國共產黨得以完成許多單靠組織本身難以完成的任務，宋慶齡從而也對中國革命做出了個人奮鬥難以達到的偉大貢獻。

中國共產黨派中央委員阮嘯仙參加這個大會，並領導「禦侮會」的工作。不久，阮嘯仙

調往中央蘇區，另派熊天荊（新從莫斯科回國，以新聞記者作為公開身分）主持「禦侮會」的工作，並成立了共產黨的黨團，熊開荊任書記、「左聯」的作家劉芝明任組織，中學教師何雲任宣傳兼負責與會長宋慶齡聯繫。他們屬中共江蘇省委直接領導，省委書記史通（即章漢夫）與熊天荊單線聯繫。¹⁸⁴

「禦侮會」成立後，上海幾個區也成立了分會，開展了一些抗日宣傳和組織募捐、接濟東北義勇軍等活動。但是，由於當時中共中央的「左」傾路線還沒有糾正，對許多「左」的做法宋慶齡很難接受。同時，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援救被捕革命志士的工作十分繁重，宋慶齡的確也無暇顧及「禦侮會」的工作。四月中旬，宋慶齡就因勞累過度而病倒了。恰巧在這時，「禦侮會」因公開購買武器、鼓吹武裝暴動的極「左」行動，被租界捕房搜查了總會，講解員也在華界發表演說時被捕。「禦侮會」實際由共產黨主持的內幕很快就被中外反動派偵知。宋慶齡自知難以勝任會長之職，就在十三日一方面函請沈鈞儒律師負責向有關當局交涉總會被搜及講解員被捕之事，進行營救；一方面致函「禦侮會」總會請求辭去會長之職，說願以會員一分子之地位，追隨眾人之後，努力禦侮工作。但因個人「所任其他工作，已感時間精力窮於應付，萬難再尸位誤事……慶齡對一切事業，向來量力負責，不作虛偽謙讓」。¹⁸⁵

這封信寫得語意真切，無可指摘。宋慶齡鑒於她所處的地位，難以糾正「禦侮會」、「左」

184 熊天荊：《國民禦侮自救會始末》，載上海《黨史資料》（叢刊），一九八五年第二輯。

185 《申報》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四日。

的作為，她內心很痛苦。既要她負責這個組織，而她又難以左右這個組織的行動，這是她決不能接受的。這就是宋慶齡的性格。這就是「慶齡對一切事業，向來量力負責，不作虛偽謙讓」的具體表現。

果然，在「禦侮會」接著舉行的「五一」遊行和「飛行集會」中，「左」傾錯誤大暴露，使革命力量遭到很大損失。「禦侮會」成員六十餘人被捕。次日，總會及各分會都被國民黨市政府查封。接著熊天荊、劉芝明、何雲等也先後被捕，黨團被破壞，「禦侮會」的活動就被迫停止了。

國民禦侮自救會在對人民進行抗日愛國宣傳方面曾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它存在的時間較短，僅兩三個月。活動也僅限於上海，影響有限。

共產黨的意圖是想與宋慶齡合作把這個統一戰線的抗日組織推廣到全國去，但由於受當時「左」傾錯誤的影響，使有一定基礎的群眾組織還沒有得到充分發展，就被敵人摧殘而夭折了。

宋慶齡與共產黨的這一次合作雖然失敗了，但卻為下一次再度合作——共同組織「中華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打下了基礎。

三、籌建中華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

日本帝國主義妄想獨佔中國的野心，與歐美帝國主義在華利益發生了矛盾。一九三四年

四月十七日，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長天羽竟發表狂悖聲明，儼然以「東亞主人」自居，視中國為其保護國，為日本進一步大規模侵略中國準備輿論條件，遭到中國和世界進步輿論的強烈譴責。

這樣，一方面是民族危機日益嚴重，一方面是蔣介石以空前的規模向南方蘇區發動了第五次軍事「圍剿」，而且由於已經進入蘇區的中共中央領導人排斥了毛澤東對紅軍的領導，不執行靈活機動遊擊戰爭的戰略戰術，紅軍的反「圍剿」戰爭不斷失敗。中國共產黨和紅軍面臨著生死存亡的嚴重關頭。

在這種形勢下，共產國際幫助中國共產黨制訂了在兩條戰線上反擊的計畫：「抗日救國六大綱領」和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作戰方案。為了實施這個方案，共產國際派代表尤金·鄧尼斯來華指導中國共產黨進行第五次反「圍剿」鬥爭。他進出中央蘇區時都曾逗留上海，宋慶齡多次同他共進午餐，交換對時局的意見，談論如何幫助共產黨度過目前危機的問題。當時中國革命處於極端困難的境地，但宋慶齡對革命前途仍充滿信心，憧憬新中國的到來。這些給尤金·鄧尼斯留下很深的印象。

為了在白區配合反擊，中共中央電示上海局書記盛忠亮與宋慶齡接觸，爭取得到她的幫助。盛忠亮到莫里哀路宋慶齡寓所與她會談了幾乎五個小時，向她詳細彙報了江西蘇區的困

難形勢，請求她在國民黨統治區發起運動，以減輕國民黨對蘇區的壓力。¹⁸⁶宋慶齡對蘇區連遭反革命「圍剿」表示深切關懷，向盛忠亮表示願竭盡全力來幫助共產黨。但是，當時在國民黨統治區要發起一個反對蔣介石「圍剿」蘇區紅軍的運動，顯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她答應出面籌備抗日救國六大綱領中提出的成立「中華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以及發起擁護六大綱領的簽名運動。

宋慶齡後來談到共產黨的抗日救國六大綱領怎樣由她簽名公布的情況時說：「是午夜，由地下黨召集會議。我是會長，宣佈了六大綱領。參加會議的還有美、法、比國某些著名領導人以及其他代表等。」¹⁸⁷

抗日救國六大綱領公布後，由於宋慶齡的威望和影響，這個檔深得各界人士的贊許和擁護。經過廣泛宣傳並在群眾中進行串連，一個多月的時間，只在上海一地就有成千上萬的人簽名贊成，都認為這個綱領是現時救國的唯一辦法。六月二十日，由宋慶齡領銜的一七九七位中華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籌備委員會的發起人、贊助人，決定將六大綱領以《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基本綱領》為題公諸於全國同胞，為此，同時發表《中華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籌備會對日作戰宣言》。這是「九一八」後，在國民黨政府不抵抗的情況下，繼蘇區工農民主政府和中國工農紅軍對日宣戰之後，第二個代表中國人民對日宣戰的宣言。

186 盛岳（即盛忠亮）：《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第一百六十八頁，現代史料編刊社一九八〇年版。

187 轉引自張鈺：《「老人年」回憶宋慶齡》，載《紅旗飄飄》第二十七輯，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基本綱

領》主要內容是：（一）全體武裝總

動員；（二）全體人民總動員；（三）

全體人民總武裝；（四）採取沒收日

本帝國主義在華一切財產及賣國賊財

產以解決抗日戰費；（五）成立工農

兵學商代表選舉出來的全中國民族武

裝自衛委員會；（六）聯合日本帝國

主義的一切敵人作友軍，與一切守善

意中立的國家建立友誼關係。

在綱領的「前言」中，於痛斥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國東北、上海、熱河及把中國變為其殖民地的罪行後指出，中國人民在自己的痛苦的實際的經驗當中，已經深刻地覺悟到：要想依靠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來抗日救國已經是完全沒有希望的事了。要想使美國或國際聯盟方面來幫忙反對日本，也只是一種幼稚的蠢笨的思想。「中國人民只有自己起來救自己！中國人民唯一自救和救國的方法，就是大家起來武裝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就是中華民族武裝自衛！



一九三四年，宋慶齡攝於上海。

換言之就是中國人民自動對日作戰。」¹⁸⁸

這裡反映了這個綱領「反蔣抗日」的歷史特點，起到了喚醒人民、揭露國民黨政府實行不抵抗政策的作用。

《中華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籌備會對日作戰宣言》指出，為對日作戰，必須建立共同的領導機關，把從工、農、商、學、兵中選出來的「中華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作為對日作戰的領導機關，由它決定一切抗日大計，管理一切抗日事宜。宣言號召一切愛國者響應這個綱領，在各地地方，在工廠中、農村中、學校中、商店中、機關中，都成立這種委員會，討論和決定抗日計畫與辦法。¹⁸⁹

抗日救國六大綱領的制訂和公布，民族武裝自衛會籌備會的成立，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和宋慶齡對正在上升為國內主要矛盾的民族矛盾的認識有了新的提高：把鬥爭重點開始逐步轉移到民族鬥爭上來，為實現全民族的抗戰而奮鬥。

在抗日救國六大綱領上簽字的包括了全國各個階級、階層、政黨、團體的代表，因此，它是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次嘗試，為以後中國共產黨提出建立包括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國民黨英美派在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提供了依據。¹⁹⁰

188 《紅色中華》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189 《紅色中華》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190 參見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載《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一百四十三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

這無疑是宋慶齡為中國民族解放事業做出的又一重大貢獻。

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會籌備會成立後，主要依靠各級共產黨組織和共產黨員的推動，在一些大城市建立地方組織，北平、上海還在各區成立分會，在一些大學、專科和中學中成立小組。組織最健全、活動最活躍的是東北義勇軍中的「民族武裝自衛會」組織，其次是北平。偉大的「一二·九」運動及其司令部北平市學生聯合會，就是中國共產黨通過民族武裝自衛會去發動和領導的。

「九一八」事變以來，平津處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特別是一九三三年國民黨憲兵三團調來北平後，北平的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保存下來的少數黨員分散隱蔽在黨的一些週邊組織中開展工作。由周小舟負責的民族武裝自衛會北平分會團結一批進步青年，從中發展了一些黨員，重建了地下黨的組織。這些黨員後來成為「一二·九」運動的學生領袖。

這時，日本帝國主義大搞所謂華北「自治運動」，妄想鯨吞華北五省和平津二市，民族危機空前嚴重。北平的學生悲憤地喊出：「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抗日救國成為廣大青年學生和全國人民的一致呼聲。正直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也在密切關注華北問題的動向，熱情支持中國學生的抗日愛國運動。燕京大學的張兆麟、王汝梅（黃華）、陳翰伯、龔普生、龔澎，北京大學的俞啟威（黃敬），清華大學的姚克廣（姚依林）、蔣南翔等，經常到燕京大學未名湖畔斯諾家中做客，從那裡瞭解有關時局的一些消息。這些青年懷著滿腔的抗日救國熱情，但不知道該怎麼辦。有一天，黃華、陳翰伯和斯諾商量能不能給宋

慶齡寫封信向她請教？斯諾欣然同意。於是，他們寫出一封英文信，陳述自己的愛國熱情和對時局的苦悶，並向宋慶齡請教他們應該怎麼辦？這封信由斯諾托美國女作家史沫特萊帶到上海轉交宋慶齡。十幾天後，黃華、陳翰伯從斯諾處得到了有宋慶齡親筆簽名的回信。宋慶齡在回信中，親切地稱呼他們為 Dear students（親愛的同學們），讚揚他們的愛國精神，斥責蔣介石的賣國行徑，殷切地期望北國前線的青年們「要有所表示」，「要行動起來！」宋慶齡的信，使這些青年從苦悶中解脫出來。接著，在黨的《八一宣言》的指引下，經過地下黨組織的精心計畫和周密安排，他們就積極行動起來了。民族武裝自衛會就乘賑濟黃河水災災民活動的開展，聯絡一些大學中學，成立了「黃河水災賑濟會」。救災活動結束後，該會就轉化為「北平市大中學校抗日救國學生聯合會」（北平學聯），學聯的領導人郭明秋（主席）、彭濤（黨團書記）、姚依林（秘書長）、孫敬文（交通）、董毓華等，也都是北平民族武裝自衛會的領導人。接著，在黨的領導下，北平學生就發動了轟轟烈烈的「一二·九」運動，第一次喊出了積壓在中國人民心頭的呼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從而掀起了中國革命的新高潮。

當北平「一二·九」運動的巨浪湧到黃浦江的時候，上海的抗日救亡運動立即迅速地高漲起來。宋慶齡生活在這座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我國最大的城市，她的心是與廣大愛國師生相通的。她通過親自參加北平兩次大遊行的斯諾夫婦生動的報導，詳細瞭解北平「一二·九」運動的情況。她還向北平學聯捐贈了一筆錢，作為抗日宣傳之用，由學聯主席郭明秋

簽收。191 黨一九三六年四月，中共中央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決定把全國的民族武裝自衛會組織，與共青團、社聯、左聯等週邊組織一樣全部轉入「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一九三四年四月成立的民族武裝自衛會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而宣告結束。這個組織與宋慶齡在這個期間對中國革命做出的特殊貢獻，將永遠留在中華民族光輝的史冊上。

四、主持遠東反戰會議

為爭取世界人民對中國反侵略鬥爭的支援，宋慶齡運用自己廣泛的國際聯繫，把反對日本侵華的鬥爭與國際反帝反戰的鬥爭緊密地結合起來。

早在淞滬抗戰時，宋慶齡就以世界反帝大同盟名譽主席的名義向世界進步人士呼籲，曾得到熱烈的回應。世界反帝大同盟總部曾發表一個極長宣言，痛斥日本侵略中國的罪行。高爾基在一九三二年三月二日的《消息報》上，發表了《回應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呼籲》的文章，用鋼鐵般的語言指出，無產階級能夠阻止資本家發動的戰爭，「援助中國——世界無產階級團結的表現——這是一件偉大的事業。只有無產階級能夠有力地說出：『不准干涉中國！』——能夠更加有力地證實，這並不是一句空話」。

為了進一步制止正在日益增長的世界戰爭的危機，切實幫助中國的抗日鬥爭，巴比塞和羅

191 姚依林：《「一二·九」運動回憶》；郭明秋：《回憶「一二·九」運動的黨的領導》，載《一二·九運動回憶錄》第一集，第六十三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曼·羅蘭在世界反帝大同盟的基礎上，發起組織世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者的聯合陣線，反對帝國主義戰爭，保衛社會主義蘇聯，並準備一九三二年七月份在日內瓦召開「國際非戰及反對日本對中國之侵略大會」。為此，他們在五月四日發表了《向各國勞動者宣言》，並邀請宋慶齡及蕭伯納、愛因斯坦、曼氏、德萊賽、莘克萊、陀斯·帕索斯、韋爾思、郎古印等世界著名的進步人士參加大會，還通知宋慶齡當選為大會籌備委員會和執行委員會委員。宋慶齡由於營救牛蘭夫婦一事纏身，未能參加大會。大會因帝國主義國家阻撓，後來推遲到八月底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市召開。會上成立了「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¹⁹²，羅曼·羅蘭任主席，巴比塞等人為副主席，宋慶齡等人任名譽主席。

一九三二年底，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專門討論了帝國主義國家侵略中國問題。「九一八」後，國聯理事會曾派遣一個調查團（英國的李頓任團長）來中國「調查」，「九一八」事件，後來發表了所謂「調查報告書」，極盡歪曲之能事，竟胡說「九一八」事件的發生，是因為中國人抵制日貨；日本侵華是為了消滅「赤色危險」；提議「國際共管」東北。這個調查報告書，理所當然地遭到中國人民和世界進步輿論的強烈譴責。為此，委員會決定派出巴比塞領導的代表團，重新來調查日本侵略東北的情況，以正義公道的立場揭露事件的真相，

192 「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簡稱「世界反戰委員會」；「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遠東會議」，簡稱「遠東反戰大會」。這個委員會和大會的名稱，當時有多種譯法，如反帝大同盟、反帝反法西斯大會、反帝反戰會議等。因當時宣傳重點是「反戰」而不是「反帝」，故除引文外，本書一律按宋慶齡的譯法。

同時要在中國召開遠東反戰會議。

這個決定是世界人民對中國反侵略鬥爭的一個重大支持。宋慶齡接到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發來的這個通知後，立即覆電表示歡迎，並通過中國民權保障同盟著手籌備工作。楊杏佛在二月初兩次向新聞界公開介紹了即將到來的調查團及遠東反戰大會的情況。

中國共產黨接到這個通知後，也十分重視，決定與宋慶齡共同進行歡迎調查團和籌備遠東會議的工作。起先，經與宋慶齡商量後，決定由一九三三年三月八日成立的「國民禦侮自救會」來籌備歡迎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代表團的事宜，並且已開展了一些工作。但由於「禦侮會」很快被國民黨反動政府解散，籌備工作受挫，而時間已很緊迫。於是中共中央在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指示上海局發出通知，指示各級黨組織全力以赴來進行這項工作，並責成江蘇黨組織立即組織歡迎國際代表的籌備委員會。¹⁹³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中共江蘇省委與宋慶齡協商後決定，請宋慶齡公開出面籌備，具體工作則由江蘇省委宣傳部部長馮雪峰主持。馮雪峰把這項任務交給黨的四個週邊組織「社會科學家聯盟」、「上海反帝大同盟」、「中國文化總同盟」和「左翼作家聯盟」負責，並由馮雪峰和劉芝明（上海反帝大同盟負責人）、張凌清（「社聯」代表）三人組成籌備會的核心小組，¹⁹⁴對外則成立公開的上海各界歡迎巴比塞代表團及遠東反戰會議籌備委員會，宋慶齡任主

193 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六大」以來》（上）第三百九十六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

194 張凌清：《世界反帝大同盟遠東反帝反戰會議籌備工作的一些情況》，載上海《黨史資料》（叢刊），一九八三年第一輯。

席，公開活動由民權保障同盟進行。

但是，當籌備工作正在順利進行時，風浪驟起，六月十八日，民權保障同盟總幹事楊杏佛遭國民黨特務暗殺，民權保障同盟其餘的一些領導成員也受到威脅，很難再公開活動。於是在七月中旬，民權保障同盟與上海文化學術四十多個團體及各界人士聯合，另成立了「中國領土保障同盟」，繼續進行公開的籌備工作。宋慶齡以籌備會主席名義，親自簽名發出了給上海市各團體的委任書，責成各團體積極進行遠東反戰會議的籌備工作。

八月五日，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從赤都瑞金給宋慶齡拍來賀電，代表中國工農紅軍向大會祝賀。賀電說中國工農紅軍在第四次反「圍剿」中消滅了國民黨軍隊二十師，繳槍十餘萬支，說「這不僅是中國民族革命戰爭最光輝的一頁」，也正是他們給大會的獻禮。賀電還表示他們「與蘇聯紅軍兄弟們一樣站在反帝的最前線，作為大會的有力後盾」。195

此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副主席項英、張國燾也兩次代表蘇區政府發來電報，表示：「現在中國是在兩條道路——殖民地的道路與蘇維埃的道路——的劇烈戰爭中……我們相信大會是完全同情於我們的，因此，大會的成功即是我們的成功，大會的勝利即是我們的勝利。我們領導全國工農和紅軍，一致擁護大會的順利進行，為大會的偉大前途表示熱誠的祝賀。」196

195 《紅色中華》第一百〇六期，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出版。

196 《紅色中華》第一百〇七期，一九三三年九月三日出版；另一電報載《紅色中華》第一百〇六期，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出版。

八月十八日，世界反戰委員會代表團一行四人來到上海（巴比塞因病未能來華），領隊是英國勳爵、工黨議員馬萊，團員是法國共產黨員、法共機關報《人道報》主編伐楊·古久烈，比利時社會民主黨人士瑪律度，英國人哈密爾敦。國民黨反動當局不准他們上岸，宋慶齡蔑視這項禁令，親自到船上去歡迎這些來自歐洲的反帝和平戰士。

中國共產黨和籌備會組織了聲勢浩大的群眾隊伍，歡迎國際代表的到來，散發了宋慶齡以世界反戰委員會遠東會議上海籌備委員會主席名義發表的聲明——《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聲明向人民群眾揭露了德、日、英、法、美各個帝國主義國家擴軍備戰、陰謀侵犯蘇聯、進攻弱小國家的情況，指出世界面臨著嚴重的戰爭危機，而日本侵華只是這場危機的一部分。這表明，她雖然一個人被封鎖在上海寓所中，但對中國和世界人民的命運深切地關注，時刻注視著帝國主義國家統治集團的動向。

聲明闡述了遠東會議的意義，說明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決不是孤立的。她指出，要制止帝國主義戰爭，「就必須把世界工人階級和全體勞苦大眾的戰鬥力量組織起來，唯有他們才能使帝國主義列強的戰爭計畫歸於無效」。聲明認為，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已經伸出血腥的魔爪，企圖攫取整個中國，由於中國統治階級和國民黨無恥地背叛人民，一貫破壞中國民眾抵抗侵略的努力，所以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派遣代表團前來遠東，加強遠東的反戰運動，具有很重要的意義。為此，宋慶齡呼籲「一切願意參加這個運動的人們，都派遣代表出席這次大會」；並表示特別歡迎工廠工人、失業工人、工會、工人俱樂部、農民團體、國民

黨支部、各大中學、青年學生團體、知識分子、作家、藝術家、文化團體、反帝和反日團體、抵制日貨的團體、義勇軍、各行會以及一切願意參加這鬥爭的團體，都派遣代表出席。197

這裡，已經可以明顯地看到宋慶齡具有了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思想，這使她擁護中國共產黨即將發生的新轉變——建立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有了很好的思想準備。

雖然反動當局嚴厲鎮壓，十六—十七日逮捕參加籌備工作的骨幹，其中包括大會籌備會中共核心小組的張凌清和劉芝明，但是在中共地下黨的組織下，十八日的歡迎大會仍按計劃在碼頭上舉行。工人、學生和各界人士高舉歡迎國際代表團的橫幅，手持小旗，燃放鞭炮，散發傳單。宋慶齡代表各界歡迎代表團，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演說。魯迅也參加了歡迎大會。然後，在群眾的護送下，代表團住進華懋飯店（今和平飯店）。

鬥爭取得了第一回合的勝利。反動當局層層設防，竭力破壞遠東反戰大會的召開，派警探特務包圍、跟蹤國際代表，繼續逮捕籌備會幹部和參加歡迎大會的群眾，下令華界和租界都不得租借會場等等。宋慶齡的住宅更是完全被包圍，並加以嚴密監視。但是宋慶齡說：「儘管面對著這種危險，我們依然按照我們的計畫進行工作，歡迎代表團，並且動員輿論制止侵略。反動當局一開始就對我們仇恨萬分，從各方面向我們進行迫害、恐嚇、阻撓和誹謗。我們請求來與我們合作的人，許多都被嚇走了。沒有人敢把會場租給我們……我們決不能使這

197 宋慶齡：《反對帝國主義戰爭！——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中國代表的聲明》，載一九三三年八月六日《中國論壇》雜誌，後收入《為新中國奮鬥》第六十至六十三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

些朋友長途跋涉而一無所獲，我們決定召開一次會議。我們既然被迫放棄公開會議，就準備舉行秘密會議。」¹⁹⁸

於是，宋慶齡與共產黨密切合作，與反動政府、警探特務、租界當局鬥智鬥勇，進行了一場驚心動魄的較量。代表團的活動及大會的籌備工作，完全由中共地下黨秘密安排。

由於籌備會的中共核心小組已被破壞，籌備工作就由李竹聲（書記）、黃文容（組織）、盛忠亮（宣傳）三人組成的上海中央局直接擔任。¹⁹⁹他們一面積極尋找會場，接待中外代表；一面安排國際代表到有群眾基礎的工廠、學校、貧民區開座談會。

幾經周折，江蘇省委組織部的同志終於在滬東一條僻靜的馬路旁，租到一幢四層樓紅磚洋房。為了避免引起當局的注意，由「左聯」的鄭育之等五人，臨時組成一個包括有祖孫三代成員的「家庭」，住進這套住宅；並藉口學校開運動會，購買了大量的麵包、汽水、罐頭、蘋果、橘子等。二十九日晚上，分散隱蔽在各處的代表，分批陸續進入樓內隱蔽起來，直到第二天（九月三十日）清晨，代表都已到齊（由於各國及中國反動當局的阻攔和破壞，原定中外代表八百名，只到了六十五人），穿著一身黑旗袍的宋慶齡從家裡出來，由嚮導帶領轉了幾

198 宋慶齡：《動員起來！為亞洲、太平洋區域與全世界的和平而鬥爭！——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開幕詞》，載《宋慶齡選集》第三百一十六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版。

199 黃階然（即黃文容）：《關於一九三三年上海中央局的回憶》，載上海《黨史資料》（叢刊）一九八五年第一輯。

個圈，好不容易甩掉特務的跟蹤，來到會場。在這之前，連宋慶齡也不知道會場設在哪裡。200

宋慶齡一到，會議即在四樓開始。代表們席地而坐，四位國際代表和宋慶齡坐在木箱上。

大會推選馬萊（英國勳爵、工黨議員）、古久烈（法共《人道報》主編）、瑪律度（比利時社會民主黨人）、宋慶齡及東北義勇軍代表、蘇區代表等九人為主席團。並推舉毛澤東、朱德、片山潛、魯迅、高爾基、巴比塞、台爾曼為大會名譽主席。宋慶齡任執行主席，主持會議。201

首先由宋慶齡致開幕詞。然後馬萊報告了各國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情形，痛斥帝國主義侵略，法西斯猖獗和國民黨反動派鎮壓革命、屠殺人民的罪行。

接著，宋慶齡做第二個報告——《中國的自由與反戰鬥爭》。在報告中，宋慶齡嘗試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階級分析的方法，觀察中國和世界局勢，闡述戰爭與革命以及她對各種戰爭的態度，有時還直接引用馬克思、列寧的教導。這表明，她在蘇歐幾年的確讀了不少馬克思、列寧的著作，並努力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分析觀察她親身參加中國革命實踐中碰到的問題，從而加速了她由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向共產主義者轉變的進程。

她在報告中指出：「目前是資本主義制度垂死的時代」，「無產階級領導著全世界被剝削和被壓迫的人民——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裡的工人和農民從事鬥爭。

200 鄭育之：《世界反帝大同盟在上海召開的遠東反帝反戰會議的情況》，載上海《黨史資料》（叢刊），一九八〇年第一輯。

201 參見：《出席國際反帝反戰代表大會的蘇區紅軍代表回來的報告書》，載《紅色中華》第一百二十九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出版。

因此，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便成為「我們這一時代最迫切的社會需要」。

在談到對待各種不同性質的戰爭態度時，宋慶齡認為世界上有兩種戰爭：一種是「為了要征服土地和民族，佔領新的市場以及奪取新的原料來源而發生的。所有這些戰爭都是反人民的。這些戰爭給終生勤勞的人們帶來無窮的憂患和無比的苦痛」。所以，她引用列寧說的「把戰爭變成內戰以推翻資產階級」的教導，號召人民「以自己全部的力量來反對這樣的帝國主義戰爭，以摧毀統治階級的政權」。另一種戰爭是革命戰爭，「革命階級為反對壓迫而使用武力，是完全有理由的。被壓迫人民為爭取民族解放而使用武力，是完全正確的。在這兩種情形之下，武裝鬥爭是必需的，因為反動勢力永遠不會自動放棄它們的權力」。

所以，宋慶齡理直氣壯地宣佈：「我們並不是反對一切戰爭……我們是擁護中國的武裝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反動的武力只能以革命的武力來對抗。」

多麼神聖的宣言！多麼嚴正的立場！宋慶齡這位國際和平運動的偉大戰士，她對戰爭與和平問題的論述，可以說是符合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的，是沒有絲毫和平主義的成分的。

更可貴的是，她在報告中同樣旗幟鮮明地表示自己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的立場。她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蘇區和蘇維埃政府的發展和紅軍反「圍剿」的勝利，給予很高的評價和希望，譴責國民黨正在發動的第五次「圍剿」。

她指出：廣大的蘇維埃區域已經在中國存在了許多年，「這個事實便是廣大的中國人民將走上這同一條道路的希望、諾言和保證。」又說：「只有實現無產階級革命、土地革命與反

帝革命，才可以建立使中國將來發展到社會主義的基礎。」因此，她號召人們：「團結起來，用我們最大的力量來保衛蘇區，支援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戰爭。」

報告中所有這些擲地有聲的語言，絕不是過去僅作為國民黨左派和民主主義者的宋慶齡所能說得出來的，她已經逐步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一個黨外布爾什維克了。

第三個報告是蘇區紅軍代表報告蘇區工農群眾生活鬥爭情況，生動地講述了蘇區人民群眾擁護紅軍、參加紅軍、慰勞紅軍及軍民團結保衛紅色政權的情形。

大會進行中，宋慶齡不僅主持會議，還不時用她流利的英語、法語或華語為中外代表翻譯。

三個報告以後，代表們自由發言，大家的聲音低沉而又熱烈，表示堅決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發動的戰爭。後來，宋慶齡回憶說：「我們實際上是在低聲耳語之中進行報告和討論的。」大會經過熱烈討論，通過了代表們提出的幾個提案、決議和宣言。最後，還成立了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中國分會，選舉宋慶齡為主席。

大會進行了整整一天，到傍晚才結束。然後代表們有計劃地分散撤離會場。由於保密工作做得好，上海反動當局是在街頭出現了慶祝會議勝利召開的標語、傳單及看了《大美晚報》等報紙的報導後，才知道在緊貼著公共租界巡捕房偵探頭子的住宅隔壁，曾召開了一個人數較多的國際會議。他們氣急敗壞地加緊搜捕會議代表和工作人員，但已經遲了。

由於大會召開成功，中國和國際上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反對日本侵略中國，反對國民黨反動派進攻蘇區紅軍的鬥爭進一步開展了起來，並在許多省市成立了世界反戰委員會中國分

會機構。

國際代表離滬時，大會籌備處散發了《歡送國際反戰代表宣言》。他們回到歐洲後，對上海反戰大會和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情況進行了報告和宣傳，使世界人民進一步瞭解並支持中國人民的鬥爭事業。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在中共中央被迫撤離上海，共產黨的活動在國民黨統治區日益困難的情況下，宋慶齡與共產黨密切合作，開展了以上這些鬥爭。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的特殊鬥爭——地下鬥爭的組成部分，也是宋慶齡一生革命活動中最富有傳奇色彩的部分。為了保護白區的革命火種，她不畏艱險，與國民黨反動派鬥智鬥勇。竭盡全力幫助中國共產黨，使黨的主張在白色恐怖下依然在廣大人民群眾中發生影響；特別在反抗日本侵略、反對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反對進攻紅軍、促使時局轉變到全國聯合抗日方面，收到了卓著的效果。

五、用老眼光看待「福建事變」

但是，這一時期也正是王明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統治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時候，因此，宋慶齡在與共產黨合作過程中，也自覺不自覺地接受了不同程度的「左」的影響；同時，她的思想認識也處在發展過程中，必然存在這樣那樣的局限或不足，這在對待「福建事變」的態度上，表現得比較明顯。

「福建事變」是一九三三年冬在福州發生以第十九路軍為骨幹，聯合「第三黨」等勢力，在福建發動的抗日反蔣事變。十九路軍在淞滬抗戰後被蔣介石調往福建進行反共內戰。在中國共產黨抗日主張的影響下，該軍越來越厭惡內戰，要求抗日。而「第三黨」的黃琪翔、譚平山、季方等人在鄧演達遭殺害之後，仍繼續進行反蔣活動。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對中國侵略，民族危機日益嚴重，這兩股反蔣力量聯合國民黨內李濟深、陳銘樞等一部分愛國人士，於十一月在福州發動事變，公開舉起反蔣抗日的旗幟，成立了「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通稱「福建人民政府」），並準備進行抗日反蔣的軍事行動。他們在政治上，主張「取消黨治，還政於民」；在經濟上，提出「發展民族資本，獎勵工業建設」等主張。這些主張，代表著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鄉村的富農和小地主的利益，反映出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情況下國內中間階層的要求。儘管他們的一些主張依然是改良主義的，對中國共產黨也還存有戒心，但是，它的主要傾向在客觀上是有利於全國人民要求抗日和民主的歷史潮流的。因此，對「福建事變」是應該給予積極支持和肯定的。

中國工農紅軍和中華蘇維埃政府曾同福建人民政府簽訂抗日停戰協定，是完全正確的。但是，由於共產國際對「福建事變」作了完全錯誤的估計，認為福建方面有形成新陣線反對中央蘇區的危險，因而錯誤地指示中共中央要「揭露」蔣光鼐、蔡廷鍇等的「反動本質」，並用紅軍的口號「使十九路軍嘩變」，號召十九路軍士兵投奔紅軍。為王明「左」傾教條主義所把持的中共中央，本來就把十九路軍、「第三黨」等中間派視為「最危險的敵人」，共產國際的

電示更是火上加油，於是便發表了《告全國民眾書》，對「福建事變」的性質作了錯誤的判斷，認為事變的領導者是「軍閥」，發動事變是「投機」。並指出，「福建人民政府」的一切行動，「將不過是一些過去反革命的國民黨領袖們與政客們企圖利用新的方法來欺騙民眾的把戲。他們的目的不是為了要推翻帝國主義與中國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而正是為了要維持這一統治，為了要阻止全中國民眾的革命化與他們向著蘇維埃道路的邁進！」²⁰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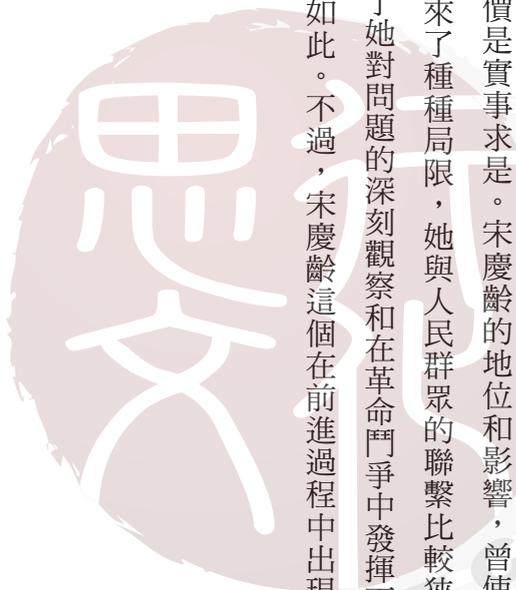
所以，中共中央和蘇區紅軍對「福建人民政府」沒有給予有力的支持，更沒有在蔣介石對它發動進攻時，在軍事上予以配合和援救；再加上事變者內部矛盾重重等原因，致使福建人民政府在蔣介石的優勢兵力圍攻下，存在不到三個月，便於一九三四年一月歸於失敗。

宋慶齡對待二十世紀三〇年代福建發生的這一重要政治事件，採取了與中共中央完全相同的態度。由於她長期以來一貫採取反蔣抗日立場，更由於她與「第三黨」有歷史淵源，同「福建人民政府」中的主要領導者如黃琪翔、陳友仁等又曾是親密戰友；在「一·二八」淞滬抗戰時又大力支持過十九路軍等，因此「福建事變」發生後，國民黨反動派就散佈謠言說宋慶齡與該事變有關，甚至散佈宋慶齡已到福建的謠言，妄圖利用這個他們視為「叛逆」的事件中傷宋慶齡。

十一月二十一日，宋慶齡發表了書面聲明，闡明自己與「福建事變」無關，駁斥國民黨

反動派所散佈的謠言。但是，她又用老眼光把福建方面簡單地斥之為「軍閥政客集團」，極力予以排斥。²⁰³實際上，她把這個複雜而進步的事件，看作她一個多月以前在遠東反戰會議報告中說的歷史上國民黨內部各派軍閥政客集團「不顧民眾的利益」，「為爭奪地盤」而進行的戰爭。²⁰⁴這顯然是受了中共中央「左」的影響，並帶有經驗主義的色彩。殊不知，即使是就像宋慶齡所觀察的那樣，為了推進中國的抗日和革命事業，也應該利用國民黨內各派的矛盾。

對於歷史人物最好的評價是實事求是。宋慶齡的地位和影響，曾使她成就許多別人難以成就的功業，但是也給她帶來了種種局限，她與人民群众的聯繫比較狹窄，在某些方面瞭解的情況不夠全面，這就妨礙了她對問題的深刻觀察和在革命鬥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對待「福建事變」所表現的態度就是如此。不過，宋慶齡這個在前進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隨著她的日益成熟，正逐步得到解決。



203 《申報》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204 宋慶齡：《中國的自由與反戰鬥爭》（一九三三年九月三十日），載《宋慶齡選集》第九十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版。